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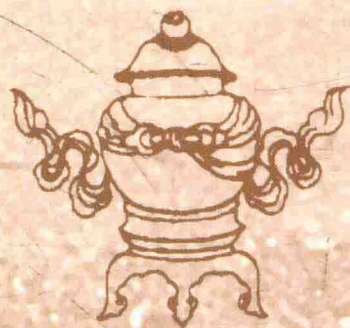
差异空间的叙事

CHAYI KONGJIAN DE
XUSHI

文学地理视野下的
《尘埃落定》

WENXUE DILI SHIYEXIA DE
CHENAILUODING

丹珍草 著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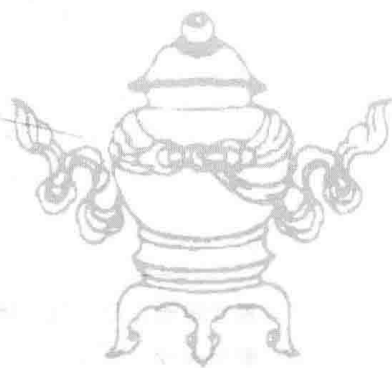
差异空间的叙事

CHAYI KONGJIAN DE
XUSHI

文学地理视野下的
《尘埃落定》

WENXUE DILI SHIYEXIA DE
CHENAILUODING

丹珍草 著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Press

• 哈尔滨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8211329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差异空间的叙事：文学地理视野下的《尘埃落定》/
丹珍草著. —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7-5674-0988-0

I. ①差… II. ①丹…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5607 号

责任编辑：赵 侠 杨秋华

封面设计：琦 琦

出版发行：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六道街 6 号 邮编：150040)

印 装：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 000 mm 1/16

印 张：23

字 数：375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451-82113296 82191620)

目 录

导 言	1
一、空间及空间观念的变革	3
二、文学地理学	7
三、空间视野下的《尘埃落定》	11
四、多民族文化视野中的《尘埃落定》	14
五、阿来写作的空间立场	17
六、《尘埃落定》研究综述	22
七、结 语	37
 第一章 嘉绒藏区地理文化空间与阿来其人其作	41
第一节 嘉绒藏区地理空间	43
一、嘉绒藏区地理空间	43
二、嘉绒藏区的地理脉息构成阿来文学创作的基础性因素	47
第二节 嘉绒藏区历史文化空间	56
一、嘉绒藏人族源构成	56
二、嘉绒藏区历史发展	64
三、土司制度与“嘉绒十八土司”	75
四、嘉绒藏区宗教	82

第三节 阿来其人其作	87
一、从幽深不断走向宽广	88
二、族群记忆与本土认同——长篇地理文化散文《大地的阶梯》	94
三、机村传说——《空山》系列	100
四、从口头传说到小说文本——长篇小说《格萨尔王》	104
五、“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阿来的诗	115
六、旧年的血迹——阿来的中短篇小说	122
结 语	127
 第二章 文化身份寻踪	130
第一节 文化身份与“流浪”	131
一、文化身份	131
二、文化身份的迷失	133
三、文化身份的混杂	140
第二节 文化身份与“寻根”	145
一、阿来的文化寻根	145
二、寻根与文化身份自我调节	150
三、阿来的文化寻根——“接近民歌就是接近灵魂”	156
第三节 文化身份建构	164
一、人是不能离开身份生活的	165
二、跨文化写作与文化身份整合	168
三、无边界的普遍性人类关怀	173
结 语	176
 第三章 第三空间语言	177
第一节 “第三空间”与“第三空间语言”	180
一、“第三空间”	180

二、“第三空间语言”概念	182
三、“第三空间语言”的内涵及特征	184
第二节 嘉绒藏语——“第三空间语言”	196
一、藏语三大方言	197
二、混融语言——嘉绒藏语	198
第三节 《尘埃落定》的“第三空间语言”特征	207
一、汉语叙事与母语表达方式的有机融合	210
二、汉语表述中富含母语意象	224
三、汉语表述与母语思维互为表里	231
结 语	236
第四章 空间化叙事策略	238
第一节 复调理论及其文学批评实践	240
一、复调	240
二、复调叙事的基础是对话	241
三、阿来小说的复调叙事	242
第二节 复调叙事方式	245
一、叙述方式的复调	246
二、叙述视角的复调	250
第三节 狂欢化书写	263
一、狂欢化	263
二、复调思维与狂欢式体裁的内在关系	265
三、《尘埃落定》的狂欢化书写	266
结 语	272
第五章 《尘埃落定》与多元文学文化传统	273
第一节 《尘埃落定》与藏文学文化传统	274

一、《尘埃落定》与藏传佛教文化	274
二、《尘埃落定》与嘉绒藏区苯教文化	280
三、《尘埃落定》与藏族口传文学	301
第二节 《尘埃落定》与汉文学文化传统	320
一、阿来的汉语阅读	320
二、阿来的汉语表达	326
第三节 世界文学对阿来文学创作的影响	330
一、聂鲁达、惠特曼与阿来	332
二、《尘埃落定》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336
三、《尘埃落定》与福克纳	341
四、阿来与奈保尔	344
结 语	348
参考文献	349

导 言

20 世纪末期,学术界的“空间转向”使地理学与文化研究诸学科呈现出交叉互渗的态势。人类生存对地理环境天然的依存关系,为文学与地理学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新文化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把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地域的多维存在,重视对地方性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文脉的研究,把地点感的研究转向“地点身份”的研究,把景观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注重景观的文化符号学意义和象征意义,并将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宗教学、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等纳入空间研究的范畴。恩斯特·卡西尔说:“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① 学术研究的“空间转向”使空间理论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敞开了大门,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空间成为事物存在的本体纬度,充满了丰富性、多元性,也充满了异质性。

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当代人并不生活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空间里,如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家庭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实用空间、休闲空间/工作空间等非此即彼的空间里,其实还生活在许多其他空间里,如想象的空间、感觉的空间、梦的空间、热情的空间等。空间从来都不是一个单面的存在,而是诸多层面的复合。在人们的实际感觉中,现实物理空间、地域空间和想象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是重叠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对于某一地域空间的感受和体验,往往不是一种单纯的地理学认知,而是一种混合了情感、记忆和历史、文化的综合体验。这种天然的复合型和重叠性特征,赋予了空间牵一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6 页。

发而动全身的网状影响力，使得空间成为一个可以扭结自然地理以及各种社会、人文关系和生活层面的关键点。

作为想象的空间，文学自身就是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是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文学空间中弥漫着自然脉息、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文学对现实社会的表现力量的呈现最终也将借助于对文学文本的多重阐释。以往的文学研究往往将文学中的“空间”等同于“文学虚构空间”，仅仅以小说描写的房间、广场等具体环境和作为叙事对象的“空间”为研究对象，而没有将空间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地域”的多维存在来进行考察。同时，以往的文学研究往往比较重视时代、思潮，注重讨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基本上是把握文学的时间流向，空间的问题相对地被忽略了。杨义先生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一书中，概括了文学的空间维度涉及的四个文化层面：“首先是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西域文化等，作为中华文明的子文化都是源流多异，风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学也千姿百态。其次，空间问题还涉及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移，并带着家族文化基因在文学领域承传和旅行。其三，空间问题还涉及作家的人生轨迹，他的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归隐地。中国文学中很多好作品，都是作家在流放的时候写出来的……最后，空间问题还涉及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和文化中心的转移。”^① 在时间维度上增加和强化文学的空间维度，便于我们从地理空间入手，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变异，寻找文学的“矿脉”，解释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

“嘉绒藏人”阿来的汉语创作明显带有文明板块接合部特有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具有典型的空间化书写特征，他以本土视野，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藏族大家庭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嘉绒部族生息的地理空间、人文脉息与集体记忆，展示了一种生动有机的地域文化身份。空间化书写构成阿来文学文本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也给读者阅读和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提供了多重思考空间。

阿来试图通过其文学创作，解读、阐释处于地理和文化“过渡地带”的“嘉绒藏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历史命运，进而探求身处多元文化背景中的

^①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嘉绒藏人”的心灵轨迹。阿来的空间化书写关涉空间地理、空间文化身份、空间生命体验、空间记忆、空间立场、空间叙事策略等诸多命题。

本书旨在以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为个案，在多元文化平行互动的比较视野中，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和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的角度，以小说文本的空间因素研究为切入点，以空间理论、文学地理学等理论作为基本方法论，对阿来及其文学创作加以探讨，并尝试从文学发生学、文学生态学的层面对阿来的《尘埃落定》予以观照。

一、空间及空间观念的变革

空间(space)因与“地方”“区域”“地图”等概念相关而成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在地理学中，空间是很具体的，它可以是一个地方、一片区域、一块土地、一个地域系统或综合体。空间又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2 000 多年以来吸引了从亚里士多德、牛顿、莱布尼茨到康德等哲学家的关注。最初的空间概念把空间当作一个不同于主体(精神实体)的客观的同质延伸(物质实体)，即把空间当作人类活动在其中展开的一个空洞容器。也就是说，空间首先被当作一个物质实体，而与空间密切相关的地理学也多集中于对实体空间进行研究和积累大量有关各个地方的知识；其次，空间又是一种关系，区位论、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区域分析都将空间作为关系的几何学。

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根源于 20 世纪下半叶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文化转型。1945 年，约瑟夫·弗兰克提出了小说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理论，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此后的 50 多年来，有关空间的研究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查特曼认为，文学空间(literary space)是指人物活动或居住其间的环境，并运用位置、场景、方位、背景、区域等具体术语表述空间的存在。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 Wegner)在其长篇论文《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中指出了空间理论的跨学科特征。他说：“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之上。”^①在菲利浦罗列的对“庞大的多种形式的”空间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

^① [美] 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程世波译，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6 页。

中，既有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师，也有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

20 世纪末期，空间研究对空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对其实体论的探讨，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空间的社会实践，关注人们在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 and 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空间变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构成了经验现象的表征和知识系统，构成了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和事件的符码。

1974 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批判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出版了法文版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提出了“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命题。该书第一次集中地、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空间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他力图纠正传统理论对空间的简单看法，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发展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者平台。他特别强调空间的社会性，认为空间是社会生成的，但同时又与社会和人的行为有某种内在关联，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冲突的和矛盾的动态过程，同时还叠加着社会、历史和空间的三重辩证，空间也是一个我们作为一种力量不断介入其中的过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地生产新的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来延续其存在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的。列斐伏尔将空间和地理分析引入马克思主义之中，使得马克思主义从纯粹的时间魔力中解放出来，也使得人们将对时间问题的关注转移到对空间问题的关注上来了。他说：“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①他指出，空间向来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的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总之，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地被生产出来的，是各种利益奋然角逐的产物。

列斐伏尔创立了一套贯通现代世界复杂情境的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立场上把握日常生活和空间生产的辩证法。他力图冲破二元对立逻辑的束缚，提出空间性、社会性和历史性三元辩证法，解构线性时间观和历史主义的单一

^① [法]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陈志梧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2 页。

统治，在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空间想象以及空间建构力量的迷宫之中展开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考。同时，他又把“他者”引入空间，“他者之永恒存在”为空间注入了一种创造差异的批判意识，将同质性空间爆破成异质性空间，把静态的真实转化成流动的真实。在此之后，空间问题开始成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中心论题之一。

米歇尔·福柯关于空间问题的论述散见于他的多部著作和有关他的访谈中。福柯在《论其他空间》一文中宣称：“当下的时代将可能首先是空间的时代。我们处在同在性的时代：我们处于并置、远与近、并排、分散的时代。”他认为，我们时代的焦虑根本上与空间有关，我们所处的场域由点和因素的邻近关系所界定，这些关系可以在形式上描述为序列、树状或网格。在《规训与惩罚》中，他以监狱为例，为读者细致地呈现了一种具体的、仪式化的权力空间变化的谱系史。米歇尔·福柯认为，人类已经从单一的空间中跳脱出来，进入一个丰富多元的空间时代。

在哲学和地理学界，从福柯到伯杰，从列斐伏尔、哈维再到迈克·克隆的《文化地理学》，都有关于空间的精辟论述。其中，爱德华·苏贾最具代表性，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出版了《肯尼亚的现代地理学》（1968）、《后现代地理学》（1989）、《第三空间》（1996）、《后大都市》（2000）等著作。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研究中，爱德华·苏贾创立了“第三空间”理论，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传统的语境分析和跨学科的理论话语。

与此同时，时空关系以及时间的空间化问题也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1984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日益被空间和空间逻辑所统治”。他宣称：“时间已经变为永恒的当下因而成空间的了。我们同过去的关系也是空间的。”1999年，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第一章第四节“现代性、时间和空间”与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第三章“时间/空间”都探讨了现代性框架中的时空关系。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状况》中提出，后现代生活中的“时间压缩”，原因在于生产和消费的加速度。此书在将空间观念和地理学引入文化和文学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戴维·哈维认为，我们的生存体验与文化实践已经遭遇到全面的空间化倾向，

其突出表征正是来势凶猛的全球化以及网络技术所生产的赛博空间^①。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产生了以杰克逊（Peter Jackson）、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1989 年，杰克逊出版的《意义的地图》（*Map of Meaning*）一书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新文化地理学以“空间”为关键词，取代了文化地理学的关键词“景观”，这是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普遍的“空间转向”之后学术互动的产物。

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使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概念、主题、理论、视域等发生了从地方到空间、从景观到文化、从客体到主体、从地到人、从整体性和无差异的人到多重主体性和认同、从区域地理学到新区域地理学、从现实世界到再现与媒体世界、从地域尺度到尺度转换、从生态系统到复杂的社会综合生态系统、从地方性到非地方性、从地图的使用到照片的使用、从线性因果关系到非线性因果关系、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等多方面的变化，并对人文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产生了影响。

新文化地理学将文化研究空间化，强调文化是人与人之间的“中介”，是“生活圈”，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种关系的“平台”，关注空间如何作为文本、意义系统、象征系统、所指系统来表达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以及民族和国家关系。这种取自文化分析视角的空间观念，倡导“全球化语境”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步展开和相辅相成。

迈克·克隆的《文化地理学》是新文化地理学的代表性专著。克隆在《文化地理学》中不仅研究作为“世界 1”的真实世界，更对“世界 2”的媒体再现表征世界进行研究，他十分关注文学、艺术、电影、电视、音乐、广告、新闻、网络等媒介中的文化景观。

克隆认为，文学作品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因为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描写，它们还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景观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甚至在

^① “赛博空间”是加拿大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84 年在其科幻小说《神经症漫游者》中创造的一个词语。此后不久，这个词语就超出科幻小说领域，在有关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领域内流行起来，并进入文化研究与分析领域。“赛博空间”既是虚拟的又是真实的。在这个“虚拟的真实空间”里，人们可以穿越物理和地理意义上的空间，甚至穿越历史和现实、过去和未来。

许多时候帮助创造了这些景观。并且，由于作品会或多或少地揭示空间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关系如何规范社会行为，所以，通过阅读不同的作品可以揭示复杂的地理空间，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知识、性别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克朗认为，景观不是一种个体特征，它们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文化的信仰、实践和技术，景观的形成反映并强化了某一社会群体的构成——谁被包括在内或谁被排除在外？它们能告诉我们有关某个民族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因此，景观的形成体现了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也会通过景观得以巩固和再生产。

新文化地理学将地方作为区位（local 即地方所在的地理空间关系）、场所（locale 即地方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文脉）和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综合，形成 Giddens 的结构化理论。同时，将“地方感”改造为“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从而将地理学引入当代学术对于各种“identity”的讨论中。关注地方的区域研究即“地域体”（locality）研究，已被发展为“新区域地理学”，它超越了传统方志学，关注空间和地域体系与全球化的关系。

新文化地理学不再把空间看作是被动的和第二位的，而是把其看作文化建构的能动力量，并致力于说明空间和地方是如何成为一种建构文化体验意义地图的核心力量的。新文化地理学更乐意将空间的关系看成是社会关系，而非几何和拓扑关系，将空间的科学研究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关注文化的空间性和空间的文化性，并强调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

综上所述，空间观念的变革可以归纳为如下序列：传统地理学（空间是地域存在）—后现代地理学（空间是社会存在）—文化地理学（空间是文化存在）—新文化地理学（空间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地域的多维存在）。新文化地理学的空间概念是长期的理论探索的结果，这一空间概念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二、文学地理学

文学地理学是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建设的一个新的分支而提出来的，是作为从地理的、空间的维度来研究文学现象的一种视角而提出来的理论。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解读作家与作品，往往会有新的启示，也会让我们对经典作品有新的理解与新的认识。如果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研究作家的想象，我们就能

发现，没有哪个作家能够超越其地理知识圈。

有研究者将文学地理学定义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①。文学地理学就是将文学研究与地理学、空间研究相结合，透过种种文学现象直趋其精神内核，着力探寻文学本原的生命形态，重新发掘和阐释文学世界的深层意义。

有学者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应包括八个主要领域：第一，作家受到自然地理、山水环境的深刻影响；第二，文学作品中对某一地理空间的建构；第三，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山水描写及其意义；第四，文学流派产生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第五，文学史的演变和地理环境变迁的关系；第六，“地理大发现”对文学作品内容所发生的影响；第七，人类对宇宙空间的新观察对作家观念所产生的影响；第八，东西方作家对地理空间的不同表达。^②

文学地理学关注的基本对象是作家与作品。作家对于地理空间的认知，作家对于自然的观察与表达，往往能够改变他的整个观念与视域，并且往往体现在其作品里。作为一种研究文学的角度，文学地理学强调对文学发生地与文学发展地的实地考察，关注作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作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正如地理学特别注意观察自然山川的构成与走向，以及自然天象的构成与演化一样。

文学发生地的地理空间与地域文化对于每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来说，都具有文学发生学意义。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作家童年和少年时代所生存的自然山水环境对其日后的创作，往往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如作家的气质个性、思维习惯、文化心理、认知方式、创作心理、情感表达，文学的构成与演变，作品的美学建构，等等。

其次，文学作品中与自然山水的描写，往往能够体现出作家本人的审美情趣、审美态度与审美个性，由此可以进一步解读作品的思想价值与美学意义。

再次，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山水具有基础性意义。从本质上说，文学作品

① 梅新林：《文学地理：文学史范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4月7日，第6版。

②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41—46页。

所建构的都是想象的空间，作品中的自然山水表达的都是作家的心理意象，是作家的情感符号，或者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符号。

文学地理学是一种“有体温的地理学”^①，涉及作家的出生地、移居地以及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作家的人生轨迹、文化中心转移等问题。这些因素往往在相互交织中产生综合效应，而地理空间和地域文化构成基础性因素。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产生形成于生产及饮食习惯与地理环境关系之上的一种文化。在不同的生态^②系统中，地理位置、海拔、纬度、气候、动植物资源等要素的不同，必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同的生产、生活条件，因而使文化出现不同的区域特征。在地域文化中，自然环境与文化相互作用，构成“生态—文化”板块，“环境—文化—人”共同构成一种共生关系和生态关系。

阐明文化的空间变化，就必然要探讨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文化地理学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将人类平等地看成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研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以及人的文化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美国学者特利·格·乔丹与利斯特·罗文垂在其《文化地理学》中认为，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因果的相互作用。这里的自然环境是指气候、地貌、土壤、植被等诸多自然要素网络而成的整体。而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必然同自然环境发生各种各样的作用。因此，文化生态学侧重“相互作用”的研究。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中指出：“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精神之差异，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化精神。”^③

另外，地域空间的多样性和区域文化的多元性，也从客观上反映了各民族族群结构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以及族群认同的多层次性。因为地域辽阔

①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第5—7页。

② “生态”是生物学术语，指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文化生态”是指文化同自然环境的关系。“文化生态”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 H. 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中首先提出的。斯图尔德认为，要研究由于人类适应环境所导致的文化变迁，以及人类在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时，文化也将显现出不同的生态现象。

③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或因地理差异、历史原因等，在许多族群的内部，又往往生活着居于不同层次的“亚群体”“次亚群体”。如美国的白人就因为原迁出国的不同而分为盎格鲁-撒克逊裔、爱尔兰裔、德裔、波兰裔等。又如，在我国的彝族内部，就有以“诺苏”“纳苏”“罗武”等自称的不同亚群体。藏族内部有“卫藏”“安多”“康巴”等不同的族群。1989年，费孝通先生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系统性理论。他说，我们可以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个大格局进一步具体化为“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两者的结合，并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族群关系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逐步把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化”而不是“政治化”。这样既尊重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与文化传统，又兼顾了国家在政治与制度上的统一性，有利于各族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彼此尊重，在文化上相互欣赏，在经济上充分交流，在政治上广泛合作，并最终真正达到各族群在各个方面的共同繁荣。

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基点上，我们由此也可以推导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借以表达文学与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文学地理学的兴起，对于考察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特别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多民族文学关系开拓了新的理论视野。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由多地域、多民族与跨地域、跨民族的多样性文学共同创造、形成的。从单一的地域文化角度，或者从单一的民族文化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而很少将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综合起来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现今中国文学史的一大缺失。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解读中国文学，就是力图从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崭新平台，从地理的、空间的维度，审视中国文学现象、形态和规律，通过多文学场景的还原与文学版图的复原，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兴多民族文学史研究范式。这不仅可以克服中国文学史研究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单向度的线性范式，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催化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为其注入新的精神养液与活力。